



西方博雅典库
Liberal Arts Book Series

当代史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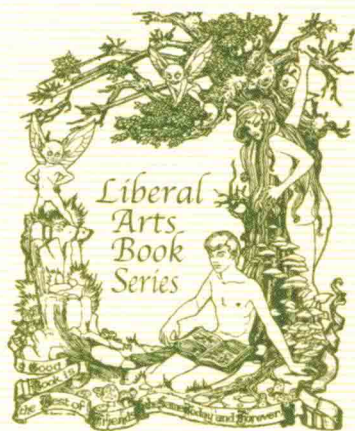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 Geoffrey Barraclough ~~

张广勇 张宇宏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ISBN 978-7-80745-905-7



9 787807 459057 >

定价: 38.00 元

<http://www.sassp.org.cn>



西方博雅典库
Liberal Arts Book Series

当代史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 Geoffrey Barraclough ~~

张广勇 张宇宏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史导论 / (英) 巴勒克拉夫(Barraclough, G.)
著; 张广勇, 张宇宏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西方博雅典库)

ISBN 978 - 7 - 80745 - 905 - 7

I. ①当… II. ①巴… ②张… ③张… III. ①世界史:
现代史—研究 IV. ①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3339 号

当代史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作 者: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译 者: 张广勇 张宇宏

特邀编辑: 蔡 羲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905 - 7/K · 141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论

——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当代史

张广勇

当代史即全球史。

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在发生着急遽的变革，“全球村”的预言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者奉行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从邈远的古代，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闭塞状态发展到现在，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与文化的变迁过程。因此，自古迄今，历史学家心中的“世界”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反映在世界史的编纂上也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

在西方，从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希罗多德起，编纂世界史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从历史学家的这一世代赍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不管在它的最初阶段步履是何等蹒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不断地加快，全球型的世界通史即全球史便应运而生了。这一学术文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

在古代，由于交通异常落后，人们的远行十分艰难。“适百里者宿舂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这句话就是当时人们长途旅行艰辛情况的写照。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区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极为有限,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只能是以他们生活的地区为中心而构成,还不可能对世界有真正的了解。因此,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史”的,不外乎是描述以各自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历史。

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便是一部具有世界眼光,记述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各国的历史,并在《大宛列传》中记载了中国人最早得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信息。在西方,足以与司马迁相媲美的是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作者视野所及,不只是古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而是古代社会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了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他虽然盛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蛮族”的文化。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①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首先,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世界历史只是他所叙述的主题——希腊波斯战争史的背景。其次,希罗多德心目中的世界只是一个地理含义上的世界,促使他把各地区的历史都结合到一起来撰写的,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统一性观念。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认识,即他还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所以他撰写的只是地理统一性的世界史,而非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渐

① 转引自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载《历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2页。

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公元前2世纪,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前122年)。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时代。在那些兵戈扰攘的岁月里,罗马东征西讨,逐一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把整个地中海变为罗马的内湖。用什么手段,由于何种政治体制,罗马人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能把整个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目睹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波里比阿乃立志著一部《通史》,一部一统于罗马的世界通史。

波里比阿的《通史》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写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①在他看来,分析个别的历史事件作用甚微,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并放在世界通史中来考察,它们才显示出意义。他说:“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因此,通过考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事件,便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走向统一的过程。

波里比阿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撰述伟业,是前人所从未做过的,不管怎样,他确是第一个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的人。他说,命运之神已把世上一切事务导入一个方向之中,使它们都走向同一的结果。同样,历史学家也应提纲挈领地为读者提供命运之神所用来完成其目的的活动。他认为,这就是促使他有勇气来叙述整个世界走向统一的这一综合过程的主要原因。他认识到自己撰写的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也就是当时整个世界的历史,而撰写这种历史最重要的是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考察诸历史事件,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他说,当我观察某些记载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事件的著作,这些历史学家都未曾试图批判地探求这种普遍的、可理解的事件的计划是何时、自何处产生的,并如何逐渐达到其目的的,而这些却不应该忽视的,因为它们

① 波里比阿:《通史》,伦敦1922年版,第1卷,第1节,第7—9页。

正是命运女神所展示的最美好、最有价值的场景。他说,倘若试图从那种仅与特殊事件有关的历史来了解这些活动,那么则与试图依靠访问最有名的城市或观察各个彼此无关的计划来获得有关整个世界的构成、性质和秩序的观念一样,都是毫无希望的;那种认为仅仅根据研究个别的历史,便能求得关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正确认识,这种观念只能是一种幻想。

在古代,波里比阿之所以具有比较明确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念,一方面是他拥有当时世界的广博知识;另一方面也是其所处时代文化思潮影响的结果。在“希腊化时代”,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世界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当时,“世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芝诺(约公元前350—前260年),他创立斯多葛学派,反对希腊其他学派把人类分为希腊人(文明人)和野蛮人,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别。芝诺认为,人都是世界的公民,这是因为人的理性是统一的、普遍的,世界上的人们都是在一种方式中顺着共同本性而生活,故而“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他看来,作为世界公民的人,没有种族、地位、区域等区别,他们都统属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世界上只有一种公民,即世界公民;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作为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文化学派,斯多葛派不仅在当时的思想界,而且对后世的文化学说,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从世界文化范围来看,“世界主义的思想得到推广,在西方是希腊化时代,在印度是孔雀王朝时代,在中国出现得稍晚一些”。^①“世界主义”思想之所以先后在一些文明社会中兴起,这是与当时各文明社会发生的历史统一的运动紧密相关。就中国而言,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非常淡薄,他们不大了解周边的情形,那时只有一个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地域观念。战国后,才产生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至战国末期,又产生了“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的记载。^②我国经过战国时期的历史统一运动,形成了秦汉统一国

① 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② 顾颉刚、董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贡》半月刊五卷,三、四期。

家。正是这种历史统一运动,促进了广阔的历史观念的产生。司马迁的《史记》的广阔的历史视野,正是这种历史统一运动的一种反映。反观西方,波里比阿的世界历史整体观,也可以作如是观。

由于波里比阿试图寻求世界历史的有机联系和历史变动的整体性,因而他被学界认为是世界性或全人类性历史的创始者。在古典文化中,在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波里比阿已达到了最广阔的历史契合观念,虽然他仍不能摆脱古代作家所难以逾越的历史循环论观念的束缚。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波里比阿著作的主题不同于犹太文化中“人类一致”的历史观念,他所说的“世界”并不能包括整个人类世界,而依旧认为“罗马世界”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

实际上,波里比阿撰写的世界通史是一部当时的国际关系史。激励作者撰写此书的动机是罗马所建立统一帝国的霸业,他的著作自然是以罗马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武力扩张为中心,主要叙述那些和罗马发生关系和纠纷的民族,反映它们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所以此书还不是一部涵盖全人类发展的世界通史。

继波里比阿之后,不少史家也开始注意撰写世界史。如波息多尼阿(约公元前135—前51年)继波里比阿之后著《历史》一书,起自公元前144年,迄于公元前82年。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90—前21年)撰《世界史》,记述北非、两河流域、黑海沿岸、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地的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但中心是希腊文明史。此书在时间上虽起自远古,但由于作者缺乏驾驭各事物之间联系的能力,故未能做到融会贯通,它不是通史性著作,而是用割裂的各国编年史的材料,编纂成的一部世界编年史。同狄奥多罗斯一样,尼古拉(公元前1世纪时人)的《世界史》也不过是选辑各家记载的汇编,非独创之作。可见,这些世界史著作,不是以作者生活的地区为中心的目光狭隘的历史,就是缺乏融会贯通的史料汇集,当不可与波里比阿的著作同日而语。

波里比阿的世界史理论虽后为某些近代的历史学家所汲取,并被加以推衍发扬,但他的编史理论和实践在当时并未能为其后继者所踵事增华,而对以后世界史编纂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的理论。

二

公元4—5世纪,是西方史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那时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而经过重新塑造”。^①此时期兴起的基督教史学思想,打破了从前以世界作为背景的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致力于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

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上,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创立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在其所著的《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认为,天地间具有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两种城原来是浑然一体的,因为人们有罪,才分开成为两种城。地上之城的罪恶是由恶魔“撒旦”造成的。地上之城是暂时的、会灭亡的;上帝之城是完美的、永存的。前者是罪恶的,是黑暗的世界;后者是善良的,是光明的世界。世界的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是光明的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历史,也就是教会的统治取代世俗国家政权统治的历史。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历史的过程不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即历史的行程,惟以上帝的意志为准;人世间的命运,全依神意的安排而定。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神的目的被奥古斯丁描绘成一种独特的进步的过程,他把这种“进步”归结于上帝。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个人类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所有的民族无一例外地都加入这一行进过程。上帝之城是由所有的民族组成的,上帝之城的城楼高耸在所有的民族上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历史已不再是世界背景的记述,而是历史探索的中心所在。他的世界史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家致力于把奥古斯丁的双城学说付诸构筑世界历史的实践。奥古斯丁的弟子奥罗修斯(约380—420年)所著的《反世俗的历史》,记述了自创世迄于410年的世界历史。在该书中,他把其师的学说推向极端,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上帝惩罚恶魔的记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载,上帝的兴灭各国,散布祸福,处置人事,都是为了振兴基督教,使它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作为最后的帝国的世俗政权终将为基督教会所取代。

到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神学史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奥古斯丁的学说。安瑟伦(1033—1109年)认为,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体现在基督教关于进步的信仰的基础上的行进过程中;人类走向新生,最终将获得解放;当达到最终目标时,历史的最后阶段将是一个不再具有进步、不再具有历史的时期。^①与奥古斯丁不同的是,安瑟伦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虽仍不能摆脱无处无时不在的上帝之手,但其关于人类不断走向进步的观念,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即世界历史是人类整体不断走向进步而达到终点的历史。这种思想在意大利基督教史家菲奥里的约希姆(约1130—1202年)那里得到了更为明显的体现。他的学说,反驳了为大多数中世纪史家所接受的对人类世俗历史的过去和将来的悲观论断,肯定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这就为以后的历史哲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另一种世俗化倾向是把神学的目的论同国家民族的现实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德意志史家弗雷辛的鄂图(约1114—1158年)在奥古斯丁双城说的基础上,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神学的目的论和政治的世界史,在《双城史》中综合叙述了自《圣经》中创世纪起至1146年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同奥罗修斯一样,他的著作也是建立在《但以理书》中的四大帝国^②依次替代的世界史分期法的基础上。但不同的是,他指出,作为继承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上帝之城已趋于融合,而他所处的时代——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在他的《双城史》中,我们看到的这种历史的终点不是处于冥冥之中的上帝之城,而是深深烙着他赞颂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盛世的印记。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只有它才能担负起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任

① 《汤因比和世界通史传统》,《汤因比史学的意义》,1961年英文版,第51页。

② 见《圣经·旧约全书》。《但以理书》是《旧约》中的一篇,共计12章,其中记述但以理梦见四大兽从地中海上来,谓四大兽的出现,预示四大帝国在世上的相继更替。

务。他的世界史是以后 19 世纪西欧一些史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撰写世界史的先导。

总体来看,在世界史编纂史上,基督教史家是作出过贡献的。首先,基督教史家创造了一种统一的纪年法——基督教纪年方法。基督教史学的奠基者攸西比厄斯(约 260—340 年)开始运用基督教纪年方法来编纂世界历史,把事件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编年体中,既不是把希腊的事件以奥林匹亚德纪年,也不是把罗马的事件以执政官分期。这种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统一纪年方法,大大方便了以后的世界史的编纂。

其次,划分历史发展时期,并注重说明各时期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中世纪编年史家大都从基督教神学思想出发,或以上帝创造人类的天数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七期,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基督教救赎前的历史和基督教救赎后的历史,例如 12 世纪的约希姆就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前基督时期、基督时期、圣灵时期三大时期,圣灵时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这种以基督教神学思想来划分世界历史发展时期,是基督教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中世纪编年史家在具体叙述世界历史时,普遍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被视为罗马帝国的继续。这种历史分期法后为基督教史家所普遍接受,并成为中世纪世界历史编纂的传统。

再次,从基督教思想出发而撰写的历史,都是一部普遍的、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通史。“这样,基督教的启示便赋予我们一种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观点,是上帝的无时间的和永恒的视野里所看到的那种从世界过去的创造到它在未来的结局”。^① 这种贯通人类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编纂,不仅是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为推动近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和世界史编纂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此,论者指出:“基督教为了以宗教为基础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竭力要超出各国和各民族的界限,因此,它是世界史理论继续发展的沃土。”^②

总之,中世纪世界历史编纂的理论和实践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 62 页。

② 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东北师大历史系 1986 年内部排印本,第 23 页。

的。一方面,某些史家继承了中世纪的传统,继续编纂中世纪式的世界通史,18世纪比较典型的是博绪埃,直至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都可以举出继承这种传统而编纂的世界通史著作;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起,他们逐渐摆脱无处无时不在的上帝之手的干扰,而假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开始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先驱者就是意大利学者、诗人但丁。

三

但丁(1265—1321年)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这就昭示世人,人类文化已开始走出中世纪。但丁认为,无论文明的目的怎样具有多样性,一切文明只具有一个同一的目的,而这种整个人类文明的普遍一致的目的是全面地、不断地发展着人的智力,使人类在一切学科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这种文化活动的延续和创新,不是由生命短促的个人或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来进行,而需要依靠所有人类的配合协调的集体力量。所以,要创建人类的整体文化,就需要世界和平,而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只有服从理性,只有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奋斗,人类才有自由。这样的自由只有在世界政治机构的治理下,才有实现的可能”。^①

但丁指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它的本份工作是不断行使其智力发展的全部能力。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的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他摒弃了神意的世界历史观念,把它还原为人类本身的创造活动,并歌颂人类创造的文化业绩,从而走出了中世纪神的文化殿堂,进入了人的文化世界。但丁是近代世界主义文化历史观的前驱。

^① 但丁·阿利盖里:《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页。

但在文艺复兴时期,新的世界史理论的确立却是由法国一批历史学家所奠定的。其时,涌现出来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他们反对把《圣经》所述当作历史,反对那种以上帝—教会为中心的世界通史体系,力图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重新提出了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1561年,法国史学家鲍杜安(1520—1573年)出版了《世界史的结构》一书。他继承和发扬了波里比阿的世界史理论,通过对地理条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世界历史应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加以认识,注重历史在时空和内容上的普遍性和联系性。他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其整体性在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世界性的。^①世界历史范围的扩大和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思想在法国史学家勒卢阿(1510—1577年)那里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人类一切种族都能相互认知,他们能互易物品,互通有无。世界各国人民是世界国家的居民,他们如同居住在一个城市那样。在他看来,全世界的人类正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应指出的是,虽然他把世界扩大到一切人类种族,但在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他对世界的了解毕竟还是有限的,他的世界史理论是建立在他所知的地域范围内。例如,为了解释各时代文化的差异和风俗习惯的演变,他构想出一种以德行为衡量标准的帝国体系的文化观。他以为,根据各个时代帝国的文明进化程度,世界历史经历了从亚述、米堤、波斯、希腊、罗马到欧洲各国(指西欧各国)的递嬗。^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正处于萌发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西欧中心论的观念。总的说来,他的思想跟他同时代的波丹差不多。

文艺复兴时期对基督教神学的世界通史体系进行过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世界史发展理论,在这方面无疑要首推历史学家让·波丹(1530—1596年)。他在其早期著作《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把历史划分为人类史、自然史、神明史,指出人类史应以人为其主题,“它叙

① 参见凯利:《近代史学的基础》,1970年英文版,第132—133页。

② 布雷塞赫:《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史学》,1983年英文版,第182页。

述的是在社会中导致人类生活变动的人类种种行为”。^① 他试图创立以人为中心的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学说,用以取代中世纪流行的世界通史体系。

波丹抛弃了中世纪传统的四大帝国的世界史分期法,而代之以从地理环境出发来考察具体历史进程的世界史三阶段学说: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他的这一学说不是建立在神谕的基础上,而是奠立在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即既研究导致社会基本组织发展的人性因素,又注重在决定人类社会组织特征中同样起作用的自然因素。他通过分析人性的基本因素和自然因素,概括了世界史三阶段的各自特征:第一阶段是笃信宗教,富于智慧;第二阶段是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第三阶段是战争和科学技术。他的分期学说对以后世界史理论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勒卢阿一样,他的分期学说也是一种处于萌发之中的西欧中心论,是黑格尔西欧中心论的先声。

世界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波丹认为这种统一性不是过去的现象,而是当时代起产生的一种现象。他说明促进这种统一的力量是:世界各地区由于贸易而不断增多的联系,广泛存在的人类共和国的观念以及诸民族的法律。由此他得出结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如通过研究各民族的法律制度,便能解释诸民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便可找出其发展的规律。

法国史学家波普利尼埃尔(1540—1608年)对编纂近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也具有影响。他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提出了“整体的历史”的概念。他考察了世界诸民族的历史,通过人类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的表述形式,勾勒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早期阶段以自然产生的歌曲、舞蹈和符号为标志,继自然阶段之后是诗的或史诗的历史阶段,而当理性思维的程度提高时,出现了散文历史写作阶段。接着他指出,他们一代学者将继之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类型——“整体的历史”,也称为世界通

① 波丹:《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1945年英文版,第15页。

史或比较历史。他虽然没有写出一部世界通史,但他却是西方世界历史编纂史中主张编纂近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的最早的倡导者。

值得提出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在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著作中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中世纪”一词。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比昂多(1388—1463年)指出,古代史已经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从那时以后开始了另一个时期。他把公元5世纪至15世纪这1000年间称为“中世纪”,即“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这两大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的看法。如彼得拉克(1304—1374年)也曾认为,历史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罗马、黑暗时代、复兴时期。另一些人文主义者的看法也与他相同:学术的灿烂时期、黑暗时期,然后是学术灿烂时期的重新到来。他们都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期。从16世纪到17世纪,这种三时期说已为学者普遍使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再把中间的这一时期称为黑暗时期,而称之为“中世纪”或“中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出现了“中世纪”一词,但人文主义史学家并没有把它付诸世界历史编纂的实践,而以这种三时期划分法来编纂世界通史的却是一位不太知名的教科书作者。1700年前不久,一位名叫凯勒尔(1638—1707年)的作者出版了《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一书。如其书名所示,他第一次把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又被称为“三部史”。这种世界史分期法,无疑是对中世纪传统的以四大帝国分期的世界史体系一次猛烈的冲击,对后世的世界史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世纪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普遍采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法来编纂世界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家注重批判基督教史学的神定论,致力于撰写某些国家或某些城市共和国的历史,但对世界史缺乏热情,其间出现的世界通史著作屈指可数。1483年福雷斯蒂(1434—1520年)出版了《世界编年史》,直到16世纪中叶,该书还一直控制了这一领域,曾多次再版。此书虽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记述,但许多学者嘲笑它是传说和事实的杂乱拼凑,且对历史的记述毫无生动可言。

16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部比较新颖的世界史著作——乔威欧(1483—1552年)所著的《我们时代的历史》。这是一部乔威欧所知世界和其所处时代的全史,记述范围包括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及其在海外的殖民地。作者在此书中贯彻了人文主义的观点,认为他所写的世界是由世俗力量而不是神的力量统治的。后法国人文主义史学家德·图(1553—1617年)模仿他的著作也写了一本《我们时代的历史》。这是一部以法兰西民族历史为中心的世界史。

从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理论和作品来看,无论是以波丹为代表的法国史家,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主义史家,他们都还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从他们的著作中仍能找到许多神学的痕迹。就波丹而言,在《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他承认上帝毕竟是万事万物的起点和终点,认识上帝是重要的,他认为历史上的一切,首先服从的是上帝准则,其次是数字规律。

表现在世界史编纂中,一些史学家仍把上帝的力量作为第一原因,而把世俗的力量作为第二原因。如17世纪初雷利(1554—1618年)所撰写的世界史,就表明了即使是一个已见到地理大发现后的新世界、知道许多新科学(如天文学、地理学)的人,也不能完全摆脱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束缚:他的世界史煞费苦心地在上帝的力量和世俗的力量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新旧时代新旧文化冲突的产物。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家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身伟大创造出发打破了神的世界历史观念,反映了对人的世界历史的觉醒,那么,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和旧教的历史学家从神出发,从各自所代表的宗教的观念和要求出发来阐述和描绘现实的世界,同样也表现了对人的世界历史的深切关注。两者是殊途同归,都走向了人的世界。

16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兴起,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而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仍竭力维护旧的封建秩序,于是在德意志、法国、英国、波兰等国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在这些国家出现的世界史,既承继了传统的中世纪式的世界史体系,又被加进了这个时代的新内容,成为为新教